金融科技重塑银行业经营效率与竞争格局

——基于2019—2025年上市银行数据的分析

一、引言

数字经济浪潮下,对银行来说,金融科技已从“锦上添花”变为生存必需。行业正从数字化基础搭建迈入深度应用阶段,国有大行资金充裕持续投入数字技术,股份制银行机制灵活抢占财富管理细分市场,而多数城商行受限于资金和人才被动追赶。现有研究多单独分析效率提升或竞争变动,缺乏对二者内在联系及不同银行差异化表现的系统梳理。本文选取2019—2025年28家上市银行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银行经营效率和行业竞争的影响,并提出差异化应对思路。

二、样本选取与研究思路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2019—2025年28家上市银行(6家国有大行、9家股份制银行、13家头部城商行),共196个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各银行年报及Wind数据库,缺失值采用均值插补。同时,参考安永2025年上市银行行业报告进行交叉验证。区别于行业报告的全行业汇总统计,本文聚焦于28家上市银行的平衡面板分析,核心变量均为作者基于各银行年报原始数据自行测算。

(二)变量定义

核心解释变量为金融科技发展指数(FinTech),由科技投入占营收比重(40%)、科技人员占比(30%)及线上零售业务收入占比(30%)加权合成,取值0至1,数值越高代表数字化成熟度越高。权重取值参见李建军等[1]的研究成果,稳健性检验采用熵值法交叉验证。

被解释变量有两个:第一是全要素生产率(TFP),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以总资产、营业支出为投入,净利润、利息净收入为产出,指数大于1表明效率提升。第二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基于28家样本银行年度总资产测算市场份额平方和。判定标准:HHI低于1500为充分竞争,1500—2500为中度集中,高于2500为高度垄断。控制变量选取资产规模与不良贷款率等因素,以排除个体差异干扰。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注:HHI均值在表中为放缩至0—1区间后的数值,对应原始值1862至1536。

三、银行业数字化发展的整体态势

从表1可知,FinTech指数均值为0.279,标准差为0.148,金融科技指数的标准差值远高于TFP、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的对应数值,能够说明数字化转型是引发银行经营指标分化的主要原因。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1.33,行业整体资产质量稳健,风险最高的银行不良率为2.12%,超出2%常规警戒线,不过暂未出现3%以上高风险极端情况,行业整体风险可控。

从时序演变看,2019年到2020年为转型适配调整期,数字化投入未能呈现出系统效应,传统风控模式的局限性开始逐渐显现,经营效率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压力。2021年到2022年属于数字化基础建设期,各个银行纷纷加快步伐搭建底层数字平台、线上业务系统,经营效率和资产质量也随之逐步得到了修复。2023年后,智能风控与普惠金融应用扩大,TFP回升,不良率持续下降。2025年国有六大行科技投入总额突破1300亿元,但增速放缓,大型银行数字化投入正从规模扩张向效率优先调整。

四、金融科技对经营效率与竞争格局的影响

(一)金融科技与经营效率的统计关联

为检验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采用皮尔逊双侧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所有核心变量相关关系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FinTech与TFP的相关系数为0.627,呈较强正相关。这意味着数字化水平越高的银行,效率改善越明显。

表2 皮尔逊相关性检验结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二)竞争格局演变的真实含义

2019年至2025年期间,行业HHI从1862降至1536,其直观变化是市场集中度下降了。然而,其值仍然在1500—2500这个中度集中范围之内。按照产业组织理论的通行观点,现在还不是充分的竞争状态,因此不能得出“垄断已被打破”这个结论。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网点渠道效应形成了挤压,中小银行获得了线上市场的业务空间和差异化空间,但是到2025年上市银行平均净息差已经低到历史低点1.40%,巨大的盈利压力下中小银行的业务布局收缩,反过来也影响了HHI。技术门槛降低与盈利约束收紧两方面因素互相制约,现有数据无法将监管政策的影响单独剥离出来,HHI的变化更可能是金融科技渗透、息差环境变化与政策监管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三)竞争压力与经营效能的转化

行业竞争和数字技术产生相互促进的效应,共同影响银行的经营效率。从数据来看,市场集中度与经营效率的负相关关系(-0.435)意味着竞争越充分,银行效率越高。适度的竞争打消了银行的经营惰性,迫使银行精简流程、提高效率、优化服务。例如,邮储银行智能反欺诈系统已覆盖数十万个客户账户,平安银行“风控大脑”可实现精准风险识别,招商银行的AI贷后预警比人工方式平均提前42天发现风险。行业竞争和数字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运营效率提高。

五、不同类型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特征

全样本分析确认了金融科技的积极影响,但把银行按类型分开看,情况更复杂一些。单因素方差检验显示组间差异显著(p<0.01)。(见表3)。

表3 不同类型银行核心指标对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注: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组FinTech与TFP均值差异均显著(p<0.01)

股份制商业银行整体表现最为亮眼。其FinTech均值最高(0.326),TFP均值也遥遥领先(1.137)。这类银行机制灵活、决策链条短,对市场信号的响应最为敏锐,能够将科技投入迅速转化为业务成果,尤其在财富管理和高附加值服务领域,已经构建起差异化的业务特色和竞争优势。

国有大行的FinTech均值(0.297)并不低,TFP(1.071)也高于城商行,但明显低于股份制银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型银行虽然客户基础雄厚、资本充足,在系统性风控上也有规模优势,但管理层级繁多、部门协调成本高企,数字化投入在传导过程中损耗较大,边际收益不如预期显著。

城商行的处境则比较严峻。其FinTech均值(0.214)和TFP均值(0.965)均低于平均水平,反映出资本、人才与数据资源方面的结构性短板。而城商行TFP的组内标准差(0.112)远高于另外两组,说明其内部已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但也透露出一个积极信号,数字化水平越高,经营效率表现越好。以宁波银行为代表的少数城商行,通过聚焦本地小微企业场景、搭建轻量级IT架构,借助智能审批和在线风控等方式实现了成本压降与效率提升。但多数城商行在上述各项指标上仍持续低于行业均值,资本金不足、专业人才短缺、数据积累薄弱等问题相互交织,使其数字化转型推进较为缓慢。

六、差异化发展路径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发现,金融科技并没有缩短银行之间的发展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不同银行之间的差距。这也告诫大家,整个行业不要以“一刀切”的方式进行数字化战略,可以按照自身情况进行差异化数智战略,避免行业同质化和“内卷”现象。

国有大行的优势是数字资源基础设施完好。下一步的挑战不再是向技术上加大投资,而在于激活现有数字资源,输出成熟的风控模型、系统架构,向中小机构提供“现货”的科技成果,把技术能力作为收益渠道。股份行则需要选择特定的垂直领域做优化,壮大财富管理、科创金融等赛道上的先行优势。城市商业银行的出路更多是轻量化与本土化,采用同业合作、技术外包的方法减少研发成本,集中资源服务本地小微企业与区域产业链。监管层面,建议进一步加强公共征信数据共享体系建设,建立起公共银行标准,对中小银行给予一定的优惠性政策,缩小建设数字银行资源的差距。

七、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28家上市银行2019—2025年期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科技对经营效率和竞争格局的影响:首先,金融科技是驱动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变量,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其次,行业集中度下降(HHI从1862降至1536),下降背后是技术、行业周期、监管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竞争焦点已从规模转向技术和数据能力;最后,不同类型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明显的K型分化趋势,不同层级银行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本文只是进行了相关性的分析,并没有对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论证,在样本的选择上也只局限于上市银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未来的研究可采用其他计量经济学方法,例如,引入工具变量或纳入更多非上市银行样本,从而为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有价值的见解。

作者:张思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李建军,李俊成.金融科技、市场竞争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J].金融研究,2024(02):78-93.

[2]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上市银行2025年回顾及未来展望[R].上海: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2026.

辽宁标准国际化与制度型开放的互动机制研究

摘要:全球经贸竞争逐步转向规则与标准博弈,制度型开放与标准国际化成为东北振兴及区域对外开放的关键抓手。本文梳理辽宁标准国际化与制度型开放的发展现状,剖析二者协同发展的现实瓶颈,从产业需求、开放平台、政策保障三大维度构建双向互动运行机制。本研究能够补齐辽宁对外开放规则短板,为东北地区依托标准赋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标准国际化;制度型开放;互动机制;辽宁;东北对外开放

全球经贸竞争已然转向规则标准层面,标准的国际化以及制度型的开放是辽宁打造东北亚对外开放前沿、实现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本文针对辽宁省内标准化以及制度创新的现状进行梳理,通过剖析二者协同发展的现实阻碍,从产业需求、开放平台、政策保障这三个维度搭建双向的互动机制,为辽宁打通标准输出与规则对接的通道、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提供实践参考。

一、辽宁标准国际化与制度型开放的现实情况

近年来,辽宁全面推进“标准强省”建设,获批3个国家标准验证点和3个国家级标委会,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23项,标准化对外开放水平大幅提升。辽宁稳步地推进“标准强省”的建设工作,依靠装备制造、化工、船舶等具备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参与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落实首个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推动本土标准和国际规则实现衔接,助力具备优势的产品破除海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秘书处的落户实现了辽宁省国际标准化组织“零的突破”,填补了中国在农业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空白,将推动中国、全球农药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辽宁依靠自贸试验区、中韩经贸合作平台开展制度型开放的试点工作,聚焦跨境贸易监管、要素流动规则的创新,对接东北亚区域经贸通行的规则。但二者双向联动却存在着短板,即标准的研制和开放制度的布局相脱节;规则转化的效率较低,部门缺乏统筹协同;标准的输出难以适配区域制度开放的需求,制约辽宁更高水平标准化对外开放提升质量和效率。

二、辽宁标准国际化与制度型开放的互动机制构建

(一)需求牵引机制:产业升级与国际规则对接

需求牵引机制是产业升级与制度开放双向互动的内生动力,基于辽宁老工业基地存在的转型方面诉求,凭借实体经济实现升级的需求来推进标准进行革新并伴随制度开放同步加以推进。依靠省内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船舶、精细化工以及农产品加工等支柱产业,确定东北亚跨境贸易市场准入规则。针对产业链高端环节存在的短板,推动本土行业标准和日韩以及欧盟通用贸易规则进行对标。以产业呈现外向化的需求作为导向,打通国内标准转变成为国际标准的通道,依靠真实外贸需求反向对地方涉外经贸制度加以优化,不断拓展“辽宁标准”海外应用范围,使产业获得发展、标准实现迭代以及与制度开放同向实现适配,从根源上破解标准与制度型开放供需出现错配。

(二)平台支撑机制:标准化服务与制度创新联动

平台支撑机制为双向产生互动提供能够落地的载体,依靠辽宁自贸试验区、中日韩经贸合作示范区、国家级标准化服务平台三大核心载体,达成标准化公共服务与地方制度创新深度耦合。利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权限,创新标准跨境互认、检验结果互通等具有辽宁特色的制度,搭建一站式标准合规咨询与跨境核验服务平台。借助对外开放园区,打破标准化服务机构与涉外监管部门数据存在的壁垒,把制度创新成果转变成为标准化服务场景,以专业化服务降低企业跨境合规成本。同时,依靠平台反馈持续对涉外开放制度细则加以优化,形成载体发挥赋能作用和双向联动的运行模式。

(三)保障促进机制:政策协同与能力建设并进

保障促进机制是维系长效双向互动的外部兜底支撑,聚焦辽宁多部门行政存在分割的痛点,搭建发改、市场监管、商务、工信等多部门横向政策协同体系,统筹全省标准出海与制度开放顶层规划。纵向衔接国家标准化战略与东北全面振兴开放政策,细化地方配套专项扶持政策,补齐政策衔接存在的断层。同时,强化区域标准化人才储备与涉外规则研判能力,搭建兼具产业技术、国际规则、涉外经贸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完善风险预警体系,防范标准对接与制度开放中存在的经贸风险,稳固二者长效互动的基础。

三、结语

本文基于辽宁对外开放现实状况,剖析实现标准国际化与制度型开放协同发展的阻碍因素,提出构建需求、平台、保障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机制。以标准赋予规则开放能量,以制度创新助力标准出海,破解辽宁对外开放协同存在的短板。未来也需关注东北亚经贸局势动态并对现有机制加以优化,释放双向赋能叠加效应,助力辽宁实现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课题项目:本文系2026年度辽宁社会科学院院课题一般项目“辽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对策建议”(项目编号:Lnsky26YB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翀(辽宁社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

数字金融生态下城市青年文化实践的现实困境与治理对策

数字金融已全面融入城市生活,不仅覆盖传统经济交易领域,还深度渗透到青年文化场景,形成了新的数字金融文化生态。城市青年作为核心使用群体,其各类文化活动都和数字金融深度绑定,让青年文化实践呈现出新特征。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文化实践的壁垒,拓宽了青年文化参与渠道,激活了文化创新活力,但过度介入也重塑了青年的文化认知和行为,引发文化实践失范问题,因此梳理困境、厘清成因、构建治理体系,对推动青年文化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数字金融生态下城市青年文化实践的发展特征

数字金融和青年文化场景融合后,形成了新的发展特征。一是门槛普惠化,数字金融提供了便捷的信贷支付服务,降低了青年参与文化活动的经济门槛,满足了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二是场景融合化,数字金融嵌入各类文化场景,推动青年文化实践从单一线下模式转为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模式;三是方式个性化,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匹配偏好、推送个性化内容,契合青年心理,推动文化实践走向个性化;四是行为常态化,灵活便捷的数字金融让轻量化文化消费成为日常,文化实践转变为常态化生活方式。

二、数字金融生态下城市青年文化实践的现实困境

(一)文化消费异化,超前消费催生非理性文化实践

数字金融的低门槛信贷服务弱化了消费的经济约束,催生了非理性消费。不少青年超出自身能力超前消费,将文化实践异化为彰显身份的工具,同时平台营销放大消费欲望,让文化消费重形式轻内涵,消解了其原有的精神与审美价值。

(二)实践逻辑功利化,资本裹挟弱化文化主体性

数字金融的资本逐利逻辑介入文化实践,弱化了文化的人文属性。不少青年参与文化活动以经济收益为目标,文化实践从自觉的精神追求转变为逐利的被动行为,青年逐渐丧失独立判断能力,文化主体性不断弱化。

(三)文化认知浅层化,碎片化实践消解文化积淀

数字金融赋能下的青年文化实践多以轻量化、碎片化、快餐式消费为主,难以形成深度浅层文化浸润与价值积淀。青年依托数字金融便捷获取各类浅层文化资源,习惯于即时娱乐性的文化满足,缺乏对经典传统文化的深度体验研读。长期浅层实践会导致青年文化视野狭隘、积淀薄弱、审美退化,难以形成深厚文化素养与认同,同时算法推送固化文化圈层,同质化和浅层文化加剧青年文化认知片面单一。

(四)价值导向模糊化:金融风险诱发文化失范

数字金融产品泛滥且存在监管漏洞,给城市青年文化实践带来潜在风险,诱发文化价值失范。部分不良金融产品捆绑不良文化,误导青年参与不良文化消费与活动,部分青年陷入消费陷阱后,甚至参与各类失范文化行为,偏离正向价值导向。此外,金融资本化逻辑渗透青年认知,导致部分青年形成错误文化观,造成文化价值观偏移。

三、数字金融生态下城市青年文化实践的治理对策

(一)规范金融业态,遏制文化消费异化

健全数字金融监管机制,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规范面向青年的金融产品投放宣传,严禁诱导不良消费,严禁金融产品捆绑不良文化,整治相关营销乱象。同时,优化数字金融供给,引导金融平台为优质文化项目赋能,推动数字金融从流量盈利转向价值赋能。引导青年文化消费回归本质,构建健康理性的青年文化消费生态。

(二)强化价值引领,重塑青年文化主体性

坚持以三类优秀文化引领青年文化实践,破除资本逻辑的过度裹挟。主流媒体、高校与社会平台应持续输出优质深度内容,打造适合青年审美的文化项目,引导青年树立正确观念。同时,常态化开展三类素养教育,帮助青年厘清文化实践的价值与商业边界,摆脱功利化认知,主动追求优质文化实践,激活青年的主体意识。

(三)优化文化供给,推动浅层实践向深度积淀转型

依托数字金融的普惠优势,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普惠供给,打破浅层快餐文化垄断。鼓励金融资本助力传统文化创新与公共文化建设等,打造深度化青年文化实践场景,引导青年从碎片化娱乐转向高质量文化实践,积累文化底蕴,厚植文化认同。同时,优化平台算法推荐,打破信息茧房,为青年推送多元优质文化内容,拓宽文化视野。

(四)构建多元共治,筑牢青年文化实践安全屏障

构建多方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形成治理合力。政府要细化治理细则,补齐监管短板,打击不良业态;平台要强化审核管控,净化传播生态;学校与家庭要联动开展相关教育,提升青年的甄别能力。引导青年自律自省,自觉抵制不良侵蚀,坚守正向立场,实现数字金融赋能与青年文化健康发展的双向共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6年湖南工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S202611528141);湖南工学院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团队项目(项目编号:HGSZZ2503);湖南工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项目编号:HGJP25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挺(湖南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杨鑫悦(湖南工学院商学院)